



悦读经典

鸟的天堂 巴金

看不出树干在什么地方。

我说许多棵榕树的时候,我的错误马上就给朋友纠正了,一个朋友说那里只有一棵榕树,另一个朋友说那里的榕树是两棵。我见过不少的大榕树,但是像这样大的榕树我却是第一次看见。我们的船渐渐地逼近榕树了。我有了机会看见它的真面目:是一棵大树,有着数不清的桠枝,枝上又生根,有许多根一直垂到地上,进了泥土里。一部分的树枝垂到水面,从远处看,就像一棵大树斜躺在水上一样。

现在正是枝叶繁茂的时节(树上已经结了小小的果子,而且有许多落下来了)。这棵榕树好像在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览给我们看。那么多的绿叶,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,不留一点缝隙。翠绿的颜色明亮地在我们的眼前闪耀,似乎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,这美丽的南国的树!

船在树下泊了片刻,岸上很湿,我们没有上去。朋友说这里是“鸟的天堂”,有许多只鸟在这棵树上做窝,农民不许人捉它们。我仿佛听见几只鸟扑翅的声音,但是等到我的眼睛注意地看那里时,我却看不见一只鸟的影子。只有无数的树根立在地上,像许多根木桩。地是湿的,大概涨潮时河水常常冲上岸去。“鸟的天堂”里没有一只鸟,我这样想道。船开了。一个朋友拨着船,缓缓地流到河中间去。

在河边田畔的小径里有几棵荔枝树。绿叶丛中垂

着累累的红色果子。我们的船就在那里流去。一个朋友拿起桨把船拨进一条小沟。在小径旁边,船停了,我们都跳上了岸。

两个朋友很快地爬到树上去,从树上抛下几枝带叶的荔枝,我同陈和叶三个人站在树下接。等到他们下地以后,我们大家一面吃荔枝,一面走回船上去。

第二天我们划着船到叶的家乡去,就是那个有山有塔的地方。从陈的小学校出发,我们又经过那个“鸟的天堂”。

这一次是在早晨,阳光照在水面上,也照在树梢。一切都显得非常明亮。我们的船也在树下泊了片刻。

起初四周非常清静。后来忽然起了一声鸟叫。朋友陈把手一拍,我们便看见一只大鸟飞起来,接着又看见第二只,第三只。我们继续拍掌。很快地这个树林变得很热闹了。到处都是鸟声,到处都是鸟影。大的、小的、花的、黑的,有的站在枝上叫,有的飞起来,有的在扑翅膀。

我注意地看。我的眼睛真是应接不暇,看清楚这只,又看漏了那只,看见了那只,第三只又飞走了。一只画眉飞了出来,给我们的拍掌声一惊,又飞进树林,站在一根小枝上兴奋地唱着,它的歌声真好听。

“走罢。”叶催我道。小船向着高塔下面的乡村流去的时候,我还回过头去看留在后面的茂盛的榕树。我有一点留恋,昨天我的眼睛骗了我。“鸟的天堂”的确是鸟的天堂啊!

巴金(1904年11月25日—2005年10月17日),中国现代作家,是第一、二、三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,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,第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。

我们在陈的小学校里吃了晚饭。热气已经退了。太阳落下了山坡,只留下一段灿烂的红霞在天边,在山头,在树梢。“我们划船去!”陈提议说。我们正站在学校门前池子旁边看山景。“好。”别的朋友高兴地接口说。

我们走过一段石子路,很快地就到了河边。那里有一个茅草搭的水阁。穿过水阁,在河边两棵大树下我们找到了几只小船。我们陆续跳在一只船上。一个朋友解开绳子,拿起竹竿一拨,船缓缓地动了,向河中间流去。三个朋友划着船,我和叶坐在船中望四周的景致。远远地一座塔耸立在山坡上,许多绿树拥抱着它。在这附近很少有那样的塔,那里就是朋友叶的家乡。河面很宽,白茫茫的水上没有波浪。船平静地在水面流动。三只桨有规律地在水里拨动。

在一个地方河面窄了。一簇簇的绿叶伸到水面来。树叶绿得可爱。这是许多棵茂盛的榕树,但是我

梅子涵:飞到别的树上看自己的那棵树

记者:您是儿童文学作家,也研究、教授儿童文学,您的枕边书是以儿童文学为主吗?

梅子涵:儿童文学固然是基本的,但别的书也常有。我不是一只仅有一棵树一根树杈的鸟,我经常飞到别的树上看自己的那棵树,我是有树林子的。从青少年时代开始,就这样飞来飞去。比如前几天是《银色的小驴》,这两天是《汉堡剧评》。一本是童话镶嵌于小说中的儿童文学,或者也可以不限于叫儿童文学,另一本是再有名不过的剧评理论。

记者:请您谈谈童年时代的阅读生活,或者记忆最深的书籍有哪些?

梅子涵:我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儿童。那个年代,上海儿童也没有普遍的阅读生活,除了上学,玩的时候多。马路上有小书摊。一分钱看一本薄的,两分钱看一本厚的,我喜欢看小人书,看着小书摊的老板,觉得他是最神气的人!

我家里有书,有文学,古今中外都有,父母都是阅读者,他们的专业、职业不是文学,但都喜欢文学。爷爷也喜欢文学,是《红楼梦》的深度阅读者、批注者,留下两套《增评补图石头记》分别给我伯伯和我父亲。我没有见过爷爷,但这些事情我都纷纷听说,也算是“家谱”。

家里有不少小说,上中学的时候,班里建立图书馆,我把《猎人笔记》《处女地》《日日夜夜》《海鸥》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《山乡巨变》《暴风雨》……全捐了,后来那些书全部成为别同学各自带回家不归还的书。

家里有零星的儿童杂志,但没有儿童文学书,就是整本书,后来我写儿童文学,问过父亲,我小的时候,家里怎么没有儿童文学书。他说,那时候,书分得没有那么细致,他小的时候,也不知道儿童文学,但读《红楼梦》。

记者:您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,那时您在当知青,短篇小说《马老师喜欢的》获1957—1979儿童文学大奖。您是从什么时候确定写儿童文学的?

梅子涵:获奖以后就写儿童文学了。因为邀请我写儿童文学的杂志多了。

我其实写过不少非儿童文学的小说,但自从写儿童文学以后,我的标签就是儿童文学作家。也有的称“儿童作家”。儿童文学作家怎么是儿童作家?



梅子涵,儿童文学作家,上海师范大学文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我也写了不少给成年人看的散文,但还是有人说这是给儿童读的。这是一种“红字”,不是霍桑《红字》的意思,是指一种固定的认定,有些滑稽。

我没有不喜欢,我们的这个红字鲜艳也充满天真。总被人觉得天真多么好!

记者:您的《女儿的故事》《戴小桥和他的哥们儿》……还有不少的短篇小说、图画书,影响很大,非常幽默,这一风格来自什么?

梅子涵:是生活激发出来的吧,或者性格本身也具备。生活遇到尴尬的事多了,无可奈何,或者出现了开阔地,不是只在“阁楼”上“小溪边”,性格和心理就可能改变了原来的模样,语言也改变,叙事出现些蹦蹦跳跳,手舞足蹈。这可能是人的一种自动机制,自己扳动了道岔,并不是专门的培育和运用。

我开始的写作是极其温柔和缠绵的,许多人都以为梅子涵是个女性。后来变得笑声多了,滑稽的成分多了,有一位著名的出版人,在火车上读《女儿的故事》,一路笑,列车员走过来问她要不要水,她问她的先生,她为什么问我要不要水?先生说,人家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要吃药!这是她先生告诉我的。

文学写作里的很多面貌,也许并不都是刻意设计、建造的,而是无意“脱壳”,飞将起来。其实我的儿童文学里,是有许多成长的艰辛和泪水的,是我把它

写轻盈了,因为我想:它是儿童文学!

记者:在您的成长过程中,有什么书对您的人生产生了影响?

梅子涵:我们这一代人,经历的年月和教育比较“丰富”,荒诞剧、滑稽戏的演出也都亲自参加过,扮演过群众角色,演得拙劣却认真。所以,我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主要不是因为一本书的阅读,而是生活路途的行走本身。

安徒生童话对我的文学写作影响是全面的,我受到了他的武装。他的诗性渗透了我。他渗透了世界。他的文学善意和柔美,强大的人性怜悯和宽恕,世界要保持,现在正被颠覆。

记者:您成为儿童文学作家,回望童年,有没有哪个文学形象是您当时的“偶像”,或者深深向往成为的人?

梅子涵:李向阳是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的形象,也是文学性形象。他是我的偶像,因为我总举起假的手的双枪,大声说:“不许动,我是双枪李向阳!”我们的童年喜爱、崇拜英雄形象。成人英雄,儿童英雄。我小时候几乎阅读过那个年代可能读到的所有歌颂战争英雄的小说。读得快,记得很牢,自以为接近了保尔·柯察金,钢铁快要炼成了。

人是逐渐长成的。好书是历史的,我们被童年的好书滋养过,没有变成坏人,保持了基本的善良,正义感,应当庆幸,感激。

记者:您重温作品是否为了寻找语感或灵感,为了写作?

梅子涵:不是那么实用。不是为了再次挖矿,筛出金粉,铸造一个新的金蔷薇,而是因为重逢的喜悦,想念书本身,它的故事和人物,它的这个和那个……它们都是小驴子,是蜘蛛夏洛,在以前的阅读时我自己织过网,我讲过它们的故事和情感给别人听,我经常讲文学故事、书籍给儿童听,他们的老师听,它们已经属于我的篇目了,成了我的书场,我的麦克风前的诗,好为人师时我把它当成一块的确好吃的糖果,当成一面旗帜升上自己的老人与海的孤单的天空……喜爱的书是自己最可靠的朋友,它驯养我,我也驯养它,互相驯养才长久亲昵,重温也是驯养,红狐狸对小王子说的驯养理论是有接受美学含义的。 据《中华读书报》